

政协委员文库



教育改变中国

JIAOYU GAIBIAN ZHONGGUO

朱永新◎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政协委员文库——

教育改变中国

朱永新◎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改变中国 / 朱永新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9

(政协委员文库)

ISBN 978-7-5034-9580-9

I. ①教… II. ①朱… III. ①教育事业—研究—中国 IV. ① 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5214 号

责任编辑: 金 硕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 插页: 1

字 数: 34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政协委员文库》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家强

委 员 沈晓昭 刘 剑 韩淑芳 刘发升 张剑荆

主 编 沈晓昭 韩淑芳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伟欣 于 洋 马合省 王文运 牛梦岳

卢祥秋 刘华夏 刘 夏 全秋生 孙 裕

李军政 李晓薇 张春霞 张蕊燕 杨玉珍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高 贝 高 芳

殷 旭 徐玉霞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潘 飞

薛媛媛 戴小璇



朱永新（2016年）



辑一 中国教育：历史遗产

-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生态环境分析 / 3
- 中国古代教育理念之贡献与局限 / 11
- 书院精神对于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 22
- 用教育串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珠 / 29
- 传承文化是教育的重要使命 / 33

辑二 中国教育：当代发展

-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教育 / 43
- 中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历程、成就、问题与建议 / 54
- 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 94
-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农村教育运动 / 104
- 让核心价值观在中小学落地生根 / 109

辑三 中国教育：战略思考

-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教育改革 / 115
- 教育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 131
- 教育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 / 147

创新教育论纲 / 158

用“五大理念”引领“十三五”教育改革发展 / 172

教育治理必须汲取民间智慧 / 179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 183

辑四 中国教育：实践探索

新教育实验的缘起、发展与愿景 / 193

改变，从阅读开始 / 203

艺术教育成人之美 / 211

习惯养成第二天性 / 230

让每个生命成为最好的自己 / 254

家校合作激活教育磁场 / 270

辑五 中国教育：未来展望

眺望未来学校 / 317

站在教育结构性变革的门口 / 327

未来学习中心构想 / 334

新时代知识分子精神 / 339

后 记 / 343

附：朱永新主要作品目录 / 345



辑一

中国教育：历史遗产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生态环境分析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生态环境是影响文化类型的关键因素之一。生态环境一般是由一定的文化或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构成的。在生态环境之中，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往往导致生产方式的差异，而生产方式的差异又造成了社会组织形态的区别。温带大陆型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华民族是以农业型的自然经济为主，而农业生产方式的绝对优势又使中国形成了以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在这个生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古代教育思想，无疑打上了它的烙印，具有明确的中国特色。所以，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特殊的生态环境。

半封闭的大陆环境

从气温带和濒海性来区分，我国属于温带大陆型。温带与热带、寒带地区不同，由于气候适中，提供了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可能成为世界文明的发祥地。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①处于东亚大陆的温带—暖温带的中国，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而滋生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

与海洋民族不同，我们的先民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上，这里东面面临着难以跨越的茫茫大海，西北横亘着遥无边际的茫茫戈壁，西南耸立着险峻难涉的青藏高原。在古代陆海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对内回旋开阔、对外则相对隔绝的半封闭地理环境。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把几千年的中华文

^① [德]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版，第124页。

化孕育在一个巨大的“避风港”内^①，造成了文化学中的所谓“隔离机制”，使中国古代文化得以绵延不断，始终没有出现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占领而被希腊化，以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族的攻击而中断的文化悲剧。

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在这个巨大的避风港内生长和发展，加之古代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使得我们的祖先一直把自己的国度当作世界的主体，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央，所以有“中国者，天下之中也”之说，并把周边地区视为“四夷”“蛮貊”。执着的大陆民族自我意识，也使中华民族产生了“月是故乡明”的眷恋国土乡邦的情怀，使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上^②重视爱国主义的倾向非常突出。列宁在《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中曾揭示了文化的“隔离机制”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③从陆游“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的诗句，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无不折射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

农业型的自然经济

大陆民族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大漠大陆型（中亚，游牧经济）、草原—森林大陆型（东欧，半农半牧经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大河大陆型。大河大陆给人们提供了平坦的土地、温暖的气候和充沛的水源，为我们的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江苏吴县和西安半坡等地的考古发掘表明，远在七八千年前，我国就因地制宜在黄河流域种植了粟，在长江流域种植了水稻，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家。在由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进入以种植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后，教民农作的

① 韦政通著：《中国文化概论——对传统文化的解析》，水牛出版社（台北）1973年版。

② 冯天瑜、周积明著：《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8页。（译文据中央编译局重译本改正）

教育也相应出现，如《白虎通》记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

《易经·系辞》也写道：“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农业型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对于矗立其上的社会组织形态（制度）和思维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①

第一，农业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一旦获得即会长期拥有，但土地的保护与耕种及作物的栽培与收获，均为个人能力所不逮，因此必须建立以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作为劳作的基本单位，最能满足这一条件的无疑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家族。于是，维护家族的利益以及家族成员的和谐与团结成为小团体至高无上的宗旨。由于家族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因而易于将其他团体也以家族视之，将其内部的人际关系家族化，甚至把整个国家家族化，家族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形成了“家族主义”。

第二，农业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进行运作的，因此，中国古代是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社会。由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治理水源、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是农耕民族生存的首要前提；对于大自然的淫威，我们的先民就个体而言是无力抗争的，因而必须依靠大规模的群体协作，建设抵御旱涝的水利工程，而“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是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②。在集体协作中产生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遂成为专制君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王朝——夏，就是由领导治水的大禹的儿子启建立的。这样，一方面形成了寻求保护、注重权威的依附心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协作的集体意识。这对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作物秉性脆弱而生长缓慢，耕作者必须小心遵守从前的耕作方法和经验，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如果稍作技术上的改进，便很可能因为尝试错误而遭受长期的饥馑，直接威胁自身的生存。梁启超

① 杨国枢著：《中国人性格与行为的形成与蜕变》，载张文达，高质慧编《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211页。

② [美]卡尔·魏特夫著：《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先生曾论述过海洋民族所特有的开拓与冒险气质：“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利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益勇猛，日益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①在田野中耕作的农民，是不可能也无必要进行这样的冒险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遵守祖传的经验一般可以温饱自足，而主动尝试则可能颗粒无收。这自然容易形成谨小慎微、厚古薄今、不思变革的心态和行为，也造就了审视全面、处事稳重、尊重前辈的习惯及注重自然节奏、很少显露激情和走极端的风格。

第四，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地上的农作物生长缓慢，周期较长。农业生产的环节众多，作物的丰收有赖于播种、除草、施肥、灌溉、防护及收割储存，其间不仅旷日持久，而且工作辛劳。这就要求农业社会成员养成坚韧的意志力，用非常的耐心与毅力对待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中华民族崇尚勤劳、顽强、耐性的传统，不能不说与这一特点有关。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强调“业精于勤”“锲而不舍”的学习方法，也渊源于此。

第五，农业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人要利用土地栽种作物，便必须在固定的土地旁边长期厮守，长久居住。为了将子孙拴在土地上，农业社会强调祖先崇拜，鼓励承继祖先的土地与照顾祖传土地上的祖坟；强调安土重迁，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强调“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只要生计尚能维持，农业社会的成员一般不会离乡背井，抛弃故土。这种长远的定居生活造就了中国先民的永恒意识与历史感，所谓“只有百年庄农，没有百年宦宦”，“衙门财主一蓬烟，种田财主万万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之类农业社会中流行的谚语，就是这种永恒意识与历史感的流露。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异常发达以及教育思想中注重历史知识传授的传统，与这一特点不无关联。

第六，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民族不但需要居有定所，而且需要耕种有时，追求一种静态的、稳定的境界，害怕战争、骚乱和变动。因为一旦战事兴起，不仅征兵征粮，流离失所，也会影响耕种，生计难以维持。中国农民

^① 梁启超著：《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2010年版。

的最高要求就是，丰衣足食，太太平平过日子。所以，在中国人的词汇中，“动”意味着灾难降临，“静”则表示安泰祥和。崇静抑动的价值取向，使中国人的心理呈现出追求和平、崇尚中庸、讲究稳定、厌恶动乱、忌讳争斗的态势，也产生了息事宁人、得过且过的惰性心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重和谐轻竞争、重静轻动的传统，也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第七，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地的生产力总是有其上限的，如果不改进耕作方式（如轮耕），同一块土地连续种植数次之后，其生产力就会呈递减趋势。除了农忙时节，农业社会的成员生活节奏比较缓慢，色调比较单一，夫妻间没有更多的娱乐和消遣，性生活就相对频繁，加上农业社会对于人口的需求与相应的人力价值观念，生育子女成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有限的土地哺育众多的人口，自然会产生匮乏不足的状态。这样，也使得勤俭节约、悠然从容的价值观念被人们接受。

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

农业生产方式的绝对优势，使中国古代形成了世界上最具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态——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也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没有像古希腊、罗马那样发生奴隶民主派推翻氏族贵族统治的革命，由家庭奴隶制转变为劳动奴隶制，并建立起“城邦”式国家；而是由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贵族，由家庭奴隶制发展成宗族奴隶制，并建立起“家邦”式国家。这样，氏族社会的解体进行得很不充分，氏族社会遗传下来的以血缘为纽带，以父权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度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仍然保存得完好如初，并不断沿袭下来。

宗法制度之所以并未受到太大冲击和破坏，与中国古代的农业型自然经济也是分不开的，农业型的自然经济为宗法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是宗法制度赖以生存的丰厚土壤。在农业型的自然经济中，社会的基本运作单位是一家一户，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村落小镇，这些村落小镇基本上是一个宗族集团，即由家庭→家族→宗族的结构组成，所以古代的村落小镇经

常用“张家寨”“李家庄”等来命名。在此基石上，社会、国家也按照“家”的模式构建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君父合一”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形态是中国古代社会得以长期稳定、缓步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宗法制度是一种父权家长制，在宗法制度下，男性家长是整个家族的中心，他不但是家族权力的象征，也是家族财产的占有者。地位至尊的家族长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家族成员的生死存亡。当男性家长去世以后，就要从家长的所有男性后代中挑选一个人继承家长的地位。所以，只有生下男儿，才能“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使家族得以一代代繁衍发展；只有生下男儿，才是最大的“孝”，才是最大的“福”，才对得起列祖列宗。以男性为中心也有其重要的经济原因。费孝通先生曾分析说：“‘养儿防老’，这是小农经济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在一个父系社会里，女儿长大了要出嫁，成为其他生产单位的劳动力，而男孩子长大了还可以娶个媳妇，增加这个单位本身的劳动力。”^①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男性中心的社会地位更得到了巩固，出现了几乎把妇女排除在社会文化教育生活之外的倾向，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始终处在附属的地位，处在生活的最底层。古代教育思想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调也纷至沓来。

第二，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在宗法社会中，家族是按血缘的亲疏和辈分的高低来确定每个人的地位，国家是按官阶的品级来实行官僚的逐层辖制。在家族中，父亲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说文解字》在解释“父”时说“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其意义已不限于亲子的生育关系，也包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味了。所以《礼记》说“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国家的管理体制也是按家庭的形式仿造出来的，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被称为“国父”，大臣则叫作“家臣”。“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所以，中国人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明确自己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的具体位置，学会对于上级与长者的绝对服从。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就是所谓“人伦”，而“明人伦”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中

^① 费孝通著：《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与人口问题》，载《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9—500页。

教育的根本宗旨，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具体的教育内容，就是“人伦”的主要体现。

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是义务本位的社会。与等级森严的体系相适应，与权力相对应的义务观念由于统治者强调地位低下者对尊贵者——臣子对君父、妻子对丈夫、奴仆对主人、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而得到片面的、极端的夸张和扭曲，从而形成了义务本位的伦理体系。

因此，“一个人一旦生下来就处于义务罗网的包围之中。他必须按长幼亲疏、父子君臣的顺序对兄弟姐妹、对父母、对妻子（或丈夫）、对家庭、对社会、对君主、对国家尽与自己的身份相符的义务，然后作为义务的派生物，或者更通俗地说是作为义务的报酬才可以获得某种属于自己的权利”。当然，他同时也能得到他人特别是地位比自己更卑贱、低下者的义务奉献”。^①义务本位具有显著的正负效应，它既可以升华为对祖国、对人民、对历史的自觉的使命感，精忠报国、杀身成仁、为民做主、流芳千古等是正效应的典型；也可以扭曲为对君父的愚忠愚孝、对人性的粗暴摧残，“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是负效应的典型。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归根结底是义务本位的教育。

第四，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是注重血缘的社会。宗法社会的实质是以血缘关系确定人际关系，进而确定人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并由子孙将这种地位世代继承下去。中国社会对血缘关系的高度注重，典型地表现在亲属间的称谓上，如在英语中，伯伯、叔叔、舅舅都是同一词汇“uncle”，姑姑、婶婶、妯娌、姨娘则同称为“aunt”，祖父与外祖父共同使用一个称谓词“grandfather”，而祖母与外祖母则同称“grandmother”。中国还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创造出一整套以血缘亲疏为标准的辅助性称谓词，如表、堂、曾、玄、元、外、远、先、亲、干、继、后等。注重血缘关系必然导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强烈家族意识，并使之膨胀扩大，使一般人际关系也打上了浓厚的血缘标记。如称老师为师父，称朋友为哥们儿，称领导为父母官，称国人为同胞，称团体为大家庭。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心理也与此有密切关系，因为讲人情、给面子是家族中人际交往的重要准则。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

^① 高亚彪，吴丹毛著：《在民族灵魂的深处》，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提倡以和为贵、天下一家的传统，也是这种家族意识的流露与表现。

综上所述，在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农业型的自然经济以及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所组成的生态环境之上，构建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而由这块文化土壤所滋生、所哺育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显然带有其独特的风格。

（原载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